

【论 文】

“新清史” 清朝统治模式之述评¹

—— 以清朝平定和管辖新疆为中心

程秀金²

摘要：西方学者往往能够利用多种语文材料，通过其他视角诸如内亚边疆视角和世界史视角研究清朝就呈现出内亚草原帝国和早期现代帝国模式。其实这两种学术渊源都可追溯到欧文·拉铁摩尔、傅礼初等早期学者的理论探讨之中。这些研究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补正我们在开展史学研究之时，有时形成的“中原中心论”和“汉本位”的史观局限，这些思维定势往往是中国学者耳濡目染于汉文史料的自然结果，因为那些汉文史料弥漫着一种固有的“华夷观”或“传统天下观”。不过，从另一方面而言，一些西方学者也往往缺乏对中国整个历史脉络的把握，有时甚至他们的历史分析如认为清朝不属于中国的奇谈怪论，这也是需要我们加以批判从而正本清源。

关键词：新疆 清朝 内亚草原 早期现代 帝国

近三十年在美国学界兴起一种清史研究的新思潮——“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对于清朝解读和探讨尤其有别于传统见解。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认为，清代历史可以被置于三种历史轨道之中加以综合的分析认识。一种是令人熟知的中国王朝史，强调中国历朝历代处于郡县-府县体系治理之下的汉地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学术乃至其他层面的变迁连续性。另一种是最近出现的世界史视角，它将中国纳入一个主要通过海路凸显出广阔的全球联系，并在欧亚沿海推动环球贸易商品（包括白银）、技术、食用作物乃至某些思想之传播流动的世界体系之中来从事考察。但是米华健指出，无论明朝或清朝的情况，都不能用这个视角的观察而完全地反映出来，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清朝君主与欧洲统治者同样迅速地（或与后者相比更快地）以“现代”方式利用诸如现代制图学之类的后启蒙时代技术。米华健以为有必要遵循第三种历史轨道，即从中央欧亚（再加上位于欧亚边缘的有着中央欧亚根源的那些农业帝国，包括中国与俄国）的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统治下的帝国遗产角度去理解清朝。他指出，对于这一广阔地区的进一步比较研究，将加深我们对中央欧亚和欧亚边缘地带诸事件和诸趋势之间相互联系的理解。而第三种历史轨道所产生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结果，就是它消除了中央欧亚的自由的游牧政权，并将它们所领有的各族群并入新帝国（民族国家）之中³。

综合西方学者在清朝如何平定和管辖新疆上的各种见解，大体上可以被归纳在两种帝国统治模式论，即内亚草原帝国模式（上文第三种历史轨道）和早期现代帝国模式（第二种历史轨道）中间来予以评述。

一、内亚草原帝国论

米华健曾归纳出包括清帝国在内的“内亚草原帝国”的时代特征：1. 大致从15世纪直至18世纪，类似于清帝国形成的进程出现在中央欧亚很多地区。在此期间，内亚游牧人群被重新合并到大帝国

¹ 本文刊载于《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第144-158页。

²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³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edited by Lynn A. Struv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2004, pp.114-115.



或有帝国抱负的政权中去，并最终“固定”在帝国（后来民族国家）疆域之内。2. 它们在不同程度上继承着蒙古帝国的诸多遗产，尤其是在军事和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等方面。3. 这些新政权与此时崛起的强有力的宗教派别如苏菲派或藏传佛教（格鲁派）结盟。4. 所有政权，以内亚仪式、军事和管辖组织和技术来尝试或达到统一草原和农耕地区，将农耕、筑城（甚至在草原筑城）和向农业经济的征税措施（成功或未成功）加以组合¹。

（一）清统治新疆方式

米华健认为，尽管清帝国对新疆的控制遵循了汉唐的某些先例，但还是令人联想起喀喇契丹（西辽）和其他游牧政权的做法。清以天山以北的准噶尔地区作为基地来统治塔里木绿洲。这不同于汉朝，甚至也不同于唐朝，后两者将新疆总部置于该地区东部²。

表面上，特别是在他的最初几十年里，清帝国控制新疆的方法看来与准噶尔汗国、蒙兀儿汗国、喀喇汗王朝或曾控制塔里木和吐鲁番盆地的其他任何北方游牧政权没有很大差异。就其后勤补给和官僚能力而言，清朝没有突破很久之前米尔扎·海答儿（Mirzā Hardar）曾指出的环境限制：塔里木盆地绿洲不能支撑军队补给。因此清帝国驻扎四五万八旗军队（满洲人和蒙古人）在伊犁河流域和乌鲁木齐地区，而在南疆城市只有象征性驻军。但不像前代做法，清帝国并没有在收获季节径直派骑兵前往绿洲地区收税，然后扬长而去，而是创立长期统治机构深入当地社会，根据被管辖的当地居民的不同类型和族属而建立起来的当地权威（突厥语定居居民地区的伯克制，蒙古人地区的札萨克制和在吐鲁番和哈密的世袭王公制，汉人垦殖地区的汉人官员），都被置于军府管辖之下。新疆的突厥-蒙古高级官员和王公都与皇家保持着联系，通过被纳入官级品秩系列而象征性地加入清帝国征服精英行列，他们作为诸侯臣子叩谢皇恩浩荡。³

不过米华健也指出，将清统治新疆类于此前游牧统治者也很容易使人产生误会。实际上清朝突破了此前的地缘政治僵局，即只能分别从中原、蒙古或西藏之中的一地去控制新疆的局面。这一王朝通过吸纳或至少控制蒙古、准噶尔地区、青海或西藏而完全改变了上述形势。此外，不像征服大致地区的成吉思汗统治下的蒙古帝国，清帝国并没有将内亚划分为各个封地，而是将源于汉地的管辖手段和清统治精英自己对于内亚的语言、文化历史和军事经验等诸因素组合起来，并由一个集权帝国加以统治。由此新疆在清统治之下不再是角逐各方的纵横捭阖的战场，而在单一权威之下享有一个世纪的稳定（除了一些间隔以外）。为了巩固在准噶尔和塔里木地区的统治，清朝发展通信和农业设施，将货币加以系统化，利用汉人（包括回族）对新疆部分地区移民开垦。王朝也收集和出版关于新疆各方面知识的书籍为帝国统治服务。在很多方面，清朝在新疆的统治更类似于欧洲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而非匈奴、蒙古或准噶尔等早期内亚政权⁴。

为了证明这一点，米华健进一步将清朝统治新疆的方式与同时代的其他帝国模式加以比较，强调清朝对新疆没有采用汉式行省的管辖模式，而将其管辖和司法结构嵌入具有民族文化差异的地区中去。清帝国这一做法类似于奥斯曼帝国。在公文联系密集程度以及采集、分类、存档有关新臣民和新地区的各类知识，并将其用颜色划分等级方面，清朝又类似于当时的不列颠帝国和沙俄帝国，尽管起初没有实行欧洲帝国主义式的教化使命⁵。因此他认为，清帝国管理新疆与英属印度、俄属中亚的管治体制依赖多种管辖形式和当地人事制度类似，而且没有特别的证据显示清与欧洲体制的早期阶段，在有效性、施政利弊方面有什么区别。直到19世纪，欧洲帝国实施由工业支撑的教化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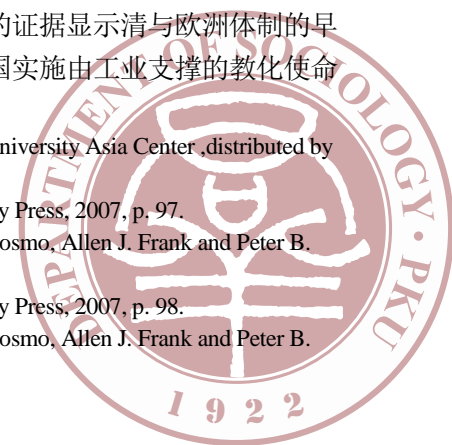
¹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edited by Lynn A. Struv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 2004, pp. 100-101.

² 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 A History of Xinjia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97.

³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ner Asia (The Chinggisid Age)*, edited by Nicolas Di Cosmo, Allen J. Frank and Peter B. Gold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72-273.

⁴ 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 A History of Xinjia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98.

⁵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ner Asia (The Chinggisid Age)*, edited by Nicolas Di Cosmo, Allen J. Frank and Peter B. Gold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73.



政策，与清相比才开始有质的不同。清朝也有着类似的帝国工程，和各个欧洲帝国工程之间有着足够的相似性可加以比较。¹

欧洲人的向外扩张，其经济动机表现得尤为明显。就清朝而言，米华健认为，并没有找到能够说明它的西进以掠夺自然资源和商业财富作为目标的证据。此外，为内地产品寻求市场也不是促使清帝国向新疆扩张的动机。实际上清廷最感兴趣的是确保这一地区达到自给自足。不过，清廷的确主张将防线从陕甘地区向遥远的西北推进，因为这样就可以间接节约财政支出，赢得“前沿防卫红利”（forward defense dividend）²。这种经济观点成为乾隆朝廷控制新疆的核心理由。就帝国主义者而言，渴望生存空间也算是一个动机，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清帝国的行动。乾隆帝本人早在1760年就提出，向幅员辽阔的新疆迁移日益增加的内地人口是有利可图的。类似的论点再次出现在19世纪有关重新征服还是应当放弃新疆失地的争论之中³。

不过米华健也指出，清朝早期统治新疆所采取的并非传统的中华帝国模式。因为那里不仅没有像中国内地那样分为府县，帝国运用了清层级旗制来创建一个包罗万象的管辖体系，以满足军事与人事的需要及监督当地精英管理的当地政府。由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新疆是清帝国的一个“保护国”或“封地”，意指它完全属于帝国的一部分。同样，新疆和青海、蒙古和满洲有时在历史地图上描绘的方式是与中国内地分开的。尽管清朝的这些内亚地区，曾以“中国鞑靼”（Chinese Tartary）的名称而与中国行省有着重要区别，所有这些地区都应被视为是帝国的完整部分。对青海、蒙古、新疆、满洲的主要管辖方式是旗制军事层级。在喀什噶利亚（南疆）少量部署军队，显示出极大的防卫软弱性，反映出从北部对这一地区实施控制的历史特色。准噶尔地区的草场可供利用，另外这也可以避免导致穆斯林城镇居民负担过重，以致影响清朝统治的稳定⁴。

米华健认为，清朝早期统治新疆的方式不属于中华帝国模式的一个明显证据，是19世纪的经世致用运动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的扩张倾向，因为龚自珍和魏源都提出要通过同化以达到防卫目的。这些论点不但突显出中华帝国模式的边疆观，而且也体现出对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满洲帝国模式的批判立场。19世纪20年代之后南疆的军事危机，以及清帝国在新疆的脆弱经济基础，促使这些主张经世致用运动的思想家只是提倡按照汉本位的设想对西域从事政治、人口、经济甚至生态方面的重新改造⁵。

不过，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却在清代新疆流放研究之中表达了与此不同的观点。她认为清朝在新疆实行的仍是中国传统王朝的管辖方式。她指出，把新近被征服的新疆作为犯人流放地的做法继续了两千年以来中国的典型做法，由此再现了传统的悖论：仰仗反抗政府的犯人以绥靖敏感地区。清朝流放以及利用流放犯人（平民和精英）是对古代做法的制度化 and 系统化，并且使这一制度获得了更高的效率。⁶卫周安认为，18世纪开疆拓土不仅起因于自然人口迁移，而且也是清政府在有意识地通过鼓励，在某种情况下是强制迁移的措施，以缓解中心地带的人口压力。因为从政府角度来看，为日益膨胀的人口增加食物供应乃是确保这个异族王朝赢得和保持强有力的公众支持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明显关注社会福利，部分体现在开疆拓土的活动之中，也是乾隆皇帝超越中国历史中最伟大统治者的雄心壮志的关键。⁷她认为，甚至在对新疆完成军事征服之前，清朝已着手引入

¹ 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 A History of Xinjia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02-106.

² “前沿防卫红利”（forward defense dividend）：将部队转移到边疆地区以缓解内地省份在地方支付开销的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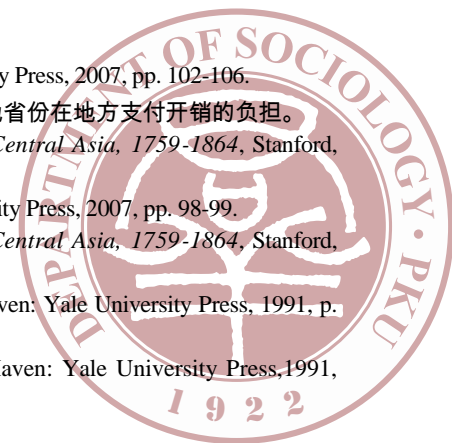
³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45-246

⁴ 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 A History of Xinjia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98-99.

⁵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44-245.

⁶ Joanna Waley-Cohen, *Exile in Mid-Qing China: Banishment to Xinjia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2.

⁷ Joanna Waley-Cohen, *Exile in Mid-Qing China: Banishment to Xinjia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拓荒者以控制这一战略地区¹。

（二）朝贡贸易与内亚控制

清朝在内亚控制和朝贡贸易体制等方面与明朝相比颇有差异。罗茂锐（Morris Rossabi）认为，明朝维系其体系几乎一个世纪，或至少直到1449年，而清朝将对外关系体制维持到19世纪，将近两个世纪。相比之下，满洲人的成就的确斐然，因为清朝面对的是一个拥有无穷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大帝国（俄国），而非只能采取游击战术攻击中国领土的游牧部落。此外，俄国接受了清朝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早期谈判中对它提出的限制²。在朝贡贸易方面，罗茂锐还分析了明清内亚贸易的差异。他认为，随着18世纪清挺进内亚地区，理藩院的主要功能从招待贡使转变到对新开辟的疆土的实施管理方面。实际上来自内亚地区的使团数量已经下降，因为要求汉地商人、官员和内亚方面的各种人员在边境或是在蒙古、满洲和中亚进行贸易。从18世纪开始，对朝廷在这方面的过度经济开销的抱怨越来越小。明朝代价高昂的使者接待费用，曾成为明廷的沉重经济负担，而到清朝却变得相对微不足道³。

与其观点相反，就朝贡贸易而言，米华健指出，鉴于费正清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对研究清朝和近代中国的历史学者拥有巨大影响，因此以下区分就显得重要。在费正清关注这个问题之前，以中国中心为基础的“朝贡制度”模式和清朝对新疆或与新疆接壤的游牧民族或其他民族的政策几乎毫无关系。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这样的边境市场（或在广州）的贸易的确讲求实效地进行着。米华健指出，我们一旦清楚清朝与哈萨克人是如何进行贸易的，就不能再接受“中国人认为所有对外关系事实上都是朝贡关系”这样的说法⁴。

不过，朝贡体制在具体场合之中还是体现出不同的特征，也绝非如米华健认为的那样与新疆边疆少数民族毫无关系。狄宇宙（Nicola Di Cosmo）认为，清朝依靠朝贡体制“结构”，将布鲁特人置于征服和统治中亚的总体战略之下，包括直接军事征服和通过当地精英实行间接统治。在与布鲁特人交往之时，清朝政策利用“朝贡”创建了一个不同的阈限（limina），据此皇帝权威并不为领土和明确管辖的疆界所限，而是作为一个运作在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势力范围。即使布鲁特部落民不完全臣属于清朝权威，但他们也不再完全独立，这种关系是“服属”（client）而非臣属（subject），它很清楚地表达在满语 *harangga aiman*（附属部落）之中。这种形势对于游牧民有着明显益处。通过接受清朝权威的象征，布鲁特首领获得市场和政治保护以反对浩罕或敌对游牧民。清朝权威也支撑了他们在其部落内部的地位。这种关系的主旨就是清朝以赏赐换取服属部落对中国皇帝优越地位的承认，也就是使朝贡方承认自己相对于清朝的“从属地位”⁵。

（三）清朝不等于中国？

米华健认为，清帝国对新疆一个世纪的统治并没有将新疆和内地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新疆和内地却通过另一种不太明确的方式建立了联系。这一联系至少为帝国话语中的一方所描述。由此他提出清帝国对中国精英们的心理效应：“中国”观念的一种变化。这一转变在19世纪20到30年代就已明显开始，但到19世纪中期仍未完成⁶。

pp.15-16.

¹ Joanna Waley-Cohen, *Exile in Mid-Qing China: Banishment to Xinjia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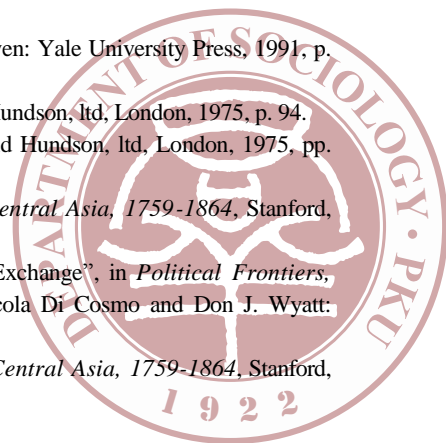
² Morris Rossabi, *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 Thames and Hundson, ltd, London, 1975, p. 94.

³ Morris Rossabi, *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 Thames and Hundson, ltd, London, 1975, pp. 160-161.

⁴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9

⁵ Nicola Di Cosmo, “Kirghiz Nomads on the Qing Frontier: Tribute, Trade, or Gift Exchange”, in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edited by Nicola Di Cosmo and Don J. Wyat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3, pp. 365-367.

⁶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迈克尔·埃德蒙·克拉克 (Michael Edmund Clarke) 也附和米华健的观点, 认为清朝在1759年至1911年间的新疆政策可谓成功, 因为它将新疆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观念有效地植入20世纪早期出现的民族意识之中。清朝150年的新疆统治直接或间接地启动这一进程, 诸如乾隆朝地理和民族志工程, 确立起中国构成的不断扩大的地理和政治概念。尽管这本身不是乾隆的明确目标。19世纪清朝在新疆所面对的一系列挑战促使它对其统治手段和策略进行再度调整。在清朝垮台之后, 新疆没有被外国吞并或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就强有力地显示出清朝构建的关于其地缘体 (geo-body) 不断扩大的观念的力量。¹

米华健竟然指出, 新疆和内地的财政制度及其运作之间的差异从另一方面提醒我们, 不应当将大清视为“中华帝国”或“中原王朝”, 而应视为一个由满洲家族统治的帝国, 它不过将中国 (China) 视为其辽阔疆域中一部分而已, 虽然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²。被他作为重要证据而提出的是, 在乾隆的《西域同文志》序言及其他文章所阐述的帝国体系之中, 文化和领土层面上的“中国”只是大清的五个主要构成部分之一, 其中心并非中国或“汉文化”, 而是清帝国皇室³。

与米华健的观点类似, 吴劳丽也认为, 清朝所设想的帝国截然不同于明朝, 不能完全将清帝国等同于中华帝国。⁴不过他们之间对于清帝国的看法也有一些差异。吴劳丽研究了《皇舆方格全图》与藏在大英图书馆里的一幅不太有名的地图。两者有关长城之内的地理信息用汉字标注, 超出中国中心地带, 而延伸到芬兰湾、红海和印度洋的地区则用满文标注。她认为, 这集中体现出乾隆皇帝支持满洲认同的显著努力。这些地图明显没能用任何划分手段将清朝的国界与世界其他地区作出划分, 这也体现出官方对于清朝大一统性质的某种注解。可见非汉民族领土, 不管在帝国之内还是在它之外, 都不是通过汉族的范式, 而是通过满洲范式而加以审视的。不像传统的儒家观念, 根据与距文明中心的距离而确定各族群的等级, 将它们垂直地加以划分。虽然以卡伦为基线, 分别使用“内”“外”等地理和位置。但这些术语的文化蕴涵和清帝国的边界毫无关联。那些归顺的族群被视为入版籍, 因此他们进入皇帝的道德秩序范围之内, 尽管并没有登记入帝国户籍。在18世纪, 乾隆皇帝的军队进军北疆 (Jungharia) 和南疆 (Altishahr) 之时, 战役的目标体现出要重新确立汉唐帝国疆界的那种观点, 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重申清朝统治的正统地位和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 而与哪些是、哪些不是中华帝国历史领土的问题无关⁵。

由此, 米华健认为, 现代的中央欧亚史学者们一直不能理解清朝扩张到欧亚大陆中心的意义, 倾向于将18世纪中叶后的中央欧亚东部简单称之为“中国”正是一个不得要领的例子。实际上清朝扩张到这一地区既是旧模式的延续, 也是一个崭新的现象, 管辖方法既是“中国式”、也是“内亚式”的。这种帝国事业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俄国以及其他地区的欧洲强国。⁶就清朝统治新疆的初期模式而言, 虽然不能被贴切称之为“中国式”, 但也许可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草原帝国主义⁷。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49

¹ Michael Edmund Clarke, *In the Eye of Power: China and Xinjiang from the Qing Conquest to the "New Great Game" for Central Asia, 1759-2004*, Ph.D Dissertation, Griffith University, 2004, pp. 512-513.

²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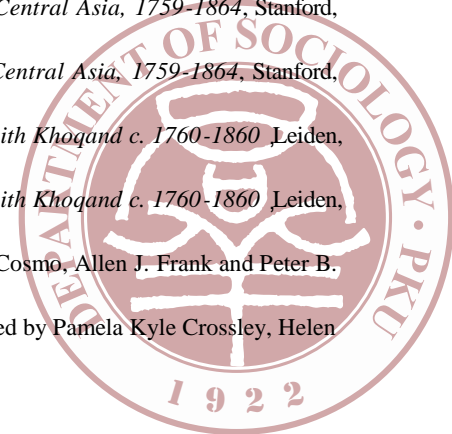
³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49.

⁴ L. J. Newby, *The Empire and the Khanat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Qing Relations with Khoqand c. 1760-1860*,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2005, p. 250

⁵ L. J. Newby, *The Empire and the Khanat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Qing Relations with Khoqand c. 1760-1860*,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2005, pp. 252-255.

⁶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ner Asia (The Chinggisid Age)*, Edited by Nicolas Di Cosmo, Allen J. Frank and Peter B. Gold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72.

⁷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edited by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u & Donald S. Sutt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 2006, p.117.



上述观点值得商榷。首先，他们忽视了早在乾隆年间就已在新疆初步设立州县制度。从历代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管辖制度演变而言，就是从羁縻制度到土司制度，最终向行省制度逐渐转变的进程，也就是从间接管辖转变为直接管辖方式，并在最后一个王朝即清朝加以全面推行。正如梅尔（Charles S. Maier）所言，近代领土的属性之一，领土不再作为一片加以监管和维持秩序的消极的封禁区域，而将成为资源、生计、产品以及能源之来源所在。领土被设想为不仅是一种获得物或是安全缓冲区，而且是作为一种实现权力和统治的决定性手段¹。因此可以说，在列强咄咄逼人的威胁之下，清朝在边疆地区建省，就管辖方式而言，就是从一个大一统帝国向一个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

其次，米华健主张清帝国的立国框架由满、蒙、汉、回、藏五大部分构成，以清朝皇室为核心，而中国（China）不过是清帝国五大构成部分之一。对此，一些欧美学者有着不同看法。艾骛德（Christopher Atwood）探讨过“效忠语言”（language of loyalty）的问题，对于划分汉语与内亚统治语言的泾渭分明的观点表示质疑，认为蒙古语对于皇恩浩荡（kesig）的观念弥漫着中原家长式的思想。针对被称之为清帝国“多元构成”的观点，他认为“清朝皇帝并不总是人格分裂般地行事，尽管其疆土具有族群多样性的特点”²。受到这一观点的启发，布罗菲（David Brophy）认为，这种“效忠语言”也提供了新疆清朝权威的话语基础³。他指出，学者们没有充分理解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准噶尔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包括这些关系的后果对于清朝与其穆斯林臣民关系的影响。他认为，根据所呈现的与伯克早期联系的档案材料和保留着他称为“衙门维吾尔语”（Yamen Uyghur）的语言痕迹，可以看出清朝新疆权威建立在准噶尔蒙古人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的。通过与准噶尔人的联系，新疆当地贵族对从政治上归属于蒙古的言说耳熟能详。这种言说后来也在他们与清廷的联系之中发挥作用。如果我们不再把新疆穆斯林视为五大平等文化区之一，也不再认为清朝意识形态侧重于如何区分其臣属族群，那么就反而能勾勒出一幅有关清朝统治者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那种关系的暂时性和地理特殊性的更精确画面。清朝统治新疆尤其依赖于哈密和吐鲁番精英，他们与准噶尔人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由此看来，布罗菲认为清朝不会将新疆穆斯林作为五大并列的文化区之一，清统治南疆穆斯林是建立在早先的准噶尔部与穆斯林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因而体现出明显的草原帝国特征。清朝在哈密、吐鲁番实行蒙古管辖模式的札萨克制度。札萨克旗制是清朝根据八旗制度的组织原则，参照蒙古原有的社会制度加以修订形成的。正是哈密、吐鲁番以及较小程度上库车贵族等家族是清朝统治新疆的根基，从哈密的额贝都拉家族和吐鲁番的额敏和卓家族以及库车的鄂对家族⁴之中选取官员去新疆各地担任阿奇木伯克、伊沙噶（伊什罕）伯克等要职⁵，兼任或辅助各派驻大臣⁶（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协办大臣、领队大臣等）管辖新疆各地，由此构建了清廷与当地穆斯林上层的紧密联系。

其三，米华健等西方学者都将中国限定为汉族王朝或是汉人在非汉王朝政权占主导位置的观点是狭隘的。另外一些西方学者则走得更远。鲍文德（Gardner Bovingdon）承认汉、唐、清各朝经营新疆，但是断章取义地否认这些王朝等同于中国。⁷斯塔尔（S. Frederick Starr）则更是走向极端，认

¹ Charles S. Maier, "Consign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 History: Alternatives for the Modern Er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3)(June 2000), p. 818.

² Christopher Atwood, "'Worshipping Grace': The Language of Loyalty in Qing Mongolia," *Late Imperial China*, 21.2 (2000), p.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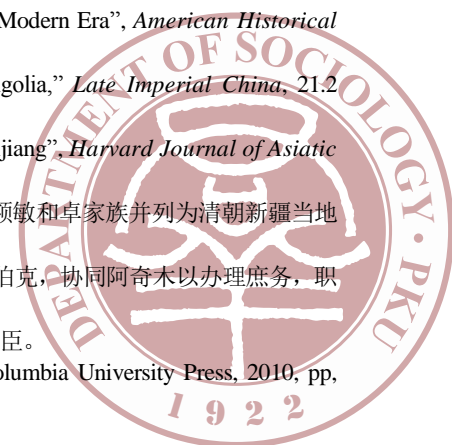
³ David Brophy, "The Junghar Mongol Legacy and the Language of Loyalty in Qing Xinjia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73, Number 2, December 2013, pp.253-254.

⁴ 库车鄂对家族虽没有实行札萨克制，但也世袭郡王，与额贝都拉家族和吐鲁番的额敏和卓家族并列为清朝新疆当地三大家族。

⁵ 阿奇木伯克，统理城村大小事务，职繁权重，为诸伯克之冠。伊沙噶（伊什罕）伯克，协同阿奇木以办理庶务，职任亦重，位即次焉。参见：《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30《官制二》。

⁶ 额敏和卓曾担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其第六子伊斯堪达尔曾担任喀什噶尔协办大臣。

⁷ Gardner Bovingdon, *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为“尽管从公元前2世纪至今，统治中国北方的各个政权有着诸多文化和制度的连续联系，但将它们普遍视为‘中国’则过于简单化，这是汉文史料在理论上信奉或继续信奉的简单化（尽管直到20世纪没有哪个国号等同于‘中国’）。而这正是今天中国国家神话的一部分。不过，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哈布斯堡王朝、墨索里尼和欧盟的政治构成也可谓共享一个文化和制度传统，但他们都不是‘罗马帝国’¹。这些学者的说法明显属于机械类比，是一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奇谈怪论。其实不仅是清朝，还有历代各内亚民族建立的诸多王朝以及各个割据政权，对于如何塑造中国也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傅礼初（Joseph F. Fletcher）认为，近世中华帝国不应当追溯到宋朝开国，而应是金朝、甚至是辽朝建立之时。从长期来看，它们传播中华文化到迄今为止难以想象的范围²。正是蒙古人在征服金帝国之后，将其制度框架加以改造以符合自己需求，并将这些特征延伸到中国次大陆³。韩森（Valerie Hansen）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在蒙古兴起之初，金人宣称自己继承北宋大统，但是他们的确有理由自视为开创者。南宋在朝政上并没有任何影响后世中国历史的创举，而女真人与其汉人谋臣合作创造出一种模式，比他们更为强大的蒙古人以及后来的满人凭借这种模式得以统治中国。后代中国历史学家竭力争辩，认为异族统治下的华夏文明走入歧途。但实际情况是在中国历史的最后一千年内，这种文化却成了常道而不是歧途⁴。

二、早期现代帝国论

就清朝平定和管辖新疆模式而言，濮德培（Peter C. Perdue）等人基于“欧亚类似论”（Eurasian similarity thesis，简称为EST），主张清朝是一个早期现代帝国。他认为“一旦摆脱民族主义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我们也可将清朝与纵贯欧亚大陆的其他帝国的形成加以比较，即可见清朝更像一个殖民帝国，遵循着与早期现代世界其它海洋和大陆帝国相联系的模式”⁵。

欧亚类似论源于傅礼初。傅礼初在一篇遗稿之中开宗明义地主张在公元15至18世纪存在着一个早期现代世界，而中国也处于其中⁶。对于傅礼初的理论，米华健提出不同看法。米华健将清朝置于乌兹别克汗国、格鲁派、东、西蒙古各政权，或许还可以加上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莫卧儿帝国、沙俄帝国等国家的行列中，去探究它们的类似性质。在傅礼初的观点影响之下，濮德培认为，直到18世纪结束之时，中国有着与欧洲相同的经济活力。通过给予中国一种可与早期现代西方相类比但却相分离的、自身具有的活力，这些分析显示中国与世界历史真正融为一体⁷。他支持那些认为直到18世纪中叶之前清帝国与欧洲国家没有显著反差的观点。只要清朝君主面临严重的竞争，他们必须建立机构以支持展开重要的纵深军事攻势。这些军事攻势所需的各种调动影响范围超出军事本身：它改变了财政体系、商业网络、通讯技术和当地农业社会。向中央欧亚输送大量军事供给的需

25-26.

¹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edited by S. Frederick Starr, M E Sharpe Inc, 2004, pp. 28-29.

² Joseph F. Fletcher, Jr. *Bloody Tanistry: Authority and Succession in the Ottoman, Indian Muslim, and Later Chinese Empires*, Unpublishe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and Popular Participation, Bellagio, Italy, 1978, p.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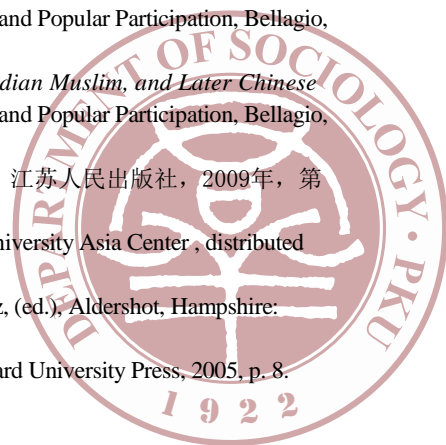
³ Joseph F. Fletcher, Jr. *Bloody Tanistry: Authority and Succession in the Ottoman, Indian Muslim, and Later Chinese Empires*, Unpublishe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and Popular Participation, Bellagio, Italy, 1978, p. 72.

⁴ [美] 韩森，《开放的帝国 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梁侃、邹劲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0-311页。

⁵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edited by Lynn A. Struv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 2004, p. 82.

⁶ Joseph F. Fletcher.,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 Beatrice Forbes Manz, (ed.), Aldershot, Hampshire: Variorum, 1995, X, p. 2

⁷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8.



求不断给西北和华北造成压力，但南方省份也因通过大运河运送粮食而间接受到影响。清朝不能不关切维持民众安宁，但国家为安全需要又不得不从他们中抽取盈余，因此早期清帝国不是一个孤立的、稳定的、统一的“东方帝国”（Oriental empire），而是一个从事动员扩张性战争的不断演进的国家组织。总之，那种以欧洲国家的鲜明特征，以多元主义、竞争或特殊的中心-边缘结构为标志的模式，过于简单地强调了西欧与欧亚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强烈反差。支持那些模式的学者们忽视了直到1750年为止欧亚东部出现的类似特征，没能精确评估横贯大陆的商业往来和军事力量之间的互动¹。

对于清朝消灭准噶尔汗国，平定天山南北，濮德培认为其意义重大。清帝国的征服从三个方面而言，是一个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首先，对于帝国的统治者和臣民而言，这些胜利根本改变了他们帝国的范围。通过国家领土的大规模扩张，征服者开启了殖民定居、贸易、管辖和文学想象的新领域。其次，清帝国扩张是17和18世纪全球进程的一部分。几乎在世界各地，新兴的集权化，整合为一体的军事化国家通过军事征服开疆扩土，而紧随其后的是定居者、传教士和商人。西欧历史学家经常将这一时代描述为“17世纪危机”，随后是18世纪的稳定，其他史学家也都在全球寻求平行的进程。他指出，将中国的帝国扩张视为全球进程一部分，有助于以更开阔的视野来审视中国，而不再将其帝国经历的任何事情视为特例。其三，中国扩张标志着欧亚历史的转折点。纵贯大陆，由中央欧亚征服者在蒙古帝国解体之后建立的大帝国获得了稠密定居的中心地带，而利用这些地区的资源来供应军队，从中心地带推进到大陆的中心。当它们在边界会合之时，通过谈判签约在草原、沙漠和绿洲之中划界，没有给边疆移动人群留下任何庇护空间。他认为，世界历史上这条大边疆的闭合，比起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93年所哀叹的那条著名的北美边疆的闭合更有意义，因为它永远地排除了游牧民持续将近三千年在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准噶尔蒙古是最后顽强地抵抗合围草原的军事力量的主要游牧国家。他们强有力地与满清军队交战。他们采用热兵器以对付周围的军事威胁。商队贸易仍旧是角逐各方税收的来源。打破此项平衡而决定性地削弱了无拘无束的游牧民的真正世界历史变革发生在1680-1760年，而清朝统治者在这场重大转变进程之中是主要力量²。

（一）清朝与历代中原王朝在经营西域方面差异

濮德培认为，历史叙事往往具有为征服提供合法化辩护的功能。历史学者们描绘出一幅中原王朝在绿洲自汉唐戍守至今的延续画卷。现代地图，如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通过描绘出帝国领土控制的清晰界限而使这一神话永存。《中国历史地图集》作为国家建构的另一个关键成分，将虚构的民族国家描画为一个地理固定的实体，有着清晰的、长期存在的延续边界。通过将空间涂上一种颜色，实际上掩饰了国家对于边疆地区的有限控制、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管辖模式以及导致城市兴衰的帝国和贸易路线的变迁。正如斯文赫定等人所发现的那样，在广阔地区存在着不确定的、孤立的定居点是司空见惯的。清朝建立永久的军事、民政体系，一直延续至今，事实上是史无前例的。他强调，不能将清对新疆的统治置于从汉朝到现代国家的一条平滑的轨道上。至于清朝得以突破前代帝国效力受挫的限制的原因，他认为军事、制度、外交和文化方面的变化都在促成这一历史特例，但18世纪的经济更是帝国能巩固其控制的基础³。

由此，濮德培竟然提出，满清王朝以及后来的中国统治者尽管要付出沉重代价，也要不断试图控制新疆，但将中国边界线限制到18世纪中叶所规定的范围，他们停止进军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地理

¹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526-527.

²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0-11.

³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36.



障碍或是中国基本的领土要求，而是偶然发生的政治和文化原因¹。他认为清朝进军新疆不属于历代王朝经营西域的历史延续，而是与早期现代帝国的征服事业联系在一起。这一观点当然可以更早追溯到他的老师，著名内亚学者傅礼初²。他们所以持有这些观点，是由于他们未能完全把握中国历史的脉络发展。金光明（Kwangmim Kim）也对这些观点表示质疑。他指出，也许可将这些学者的研究视为不是割裂历史而是割裂史学。对于中国与中亚关系的研究，尤其是从唐代到明代中国与回鹘（畏兀儿）关系的研究显示出，中国与中亚之间的互动早在清入主中原之前就已开始。回鹘（畏兀儿）统治者接受中国头衔，其商人与中国内地的长途贸易更有着长期历史，在中国散居了大批的回鹘（畏兀儿）商人和官员，中国使节远途从中亚获取朝贡马匹。傅礼初及其拥护者们以清朝作为中国伸入中亚开端，明显地忽略了清朝之前积累下来的中原与回鹘（畏兀儿）之间关系的大量史料。金光明认为，在朝贡体系礼仪框架下所展开的边疆贸易对于边疆地区人群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有着实际影响，尤其是边疆民族仰仗中原贸易来获取财富。这一状况根本改变中国-中亚关系的条件和前提，因此为清朝向中亚扩张铺平了道路。从中亚来看，清朝中亚的确立是一个早于清朝就已开始的长期过程。明朝创建进贡马匹制度造就了与中国君主利益一致的穆斯林精英和商人。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初期的清-准战争促进了官方朝贡贸易网络之外的中亚边疆贸易拓展，促使维吾尔穆斯林在商业和政治上依赖于中原。1759年征服穆斯林新疆之后，清帝国的重商政策和利用中亚商队贸易的活动既扩大了中亚穆斯林的拥护基础，也加深了商人们对于清帝国的依赖。清帝国在中亚确立统治是中亚社会与中原之间通过贸易和战争的方式而长期融合进程的结果。因此清帝国向中央欧亚的扩张可以被放置在早期现代商业中国的扩张的框架之中去加以认识，而它的实现正是建立在朝贡贸易体制之上的³。

由此，我们看出濮德培与金光明都认为清朝对于新疆的经营属于早期现代帝国扩张。但差异在于，前者认为清经营新疆并非中国历朝历代线性发展的惯性结果，而后者则认为清经营新疆仍旧是建立在中国朝贡贸易体制上的传承发展的结果。

（二）与其他欧亚帝国边疆挑战与管辖的异同

濮德培指出，准噶尔能够在面对清朝强大攻势的局势下坚持得超乎预料之久，这是由于两个因素，即机动性和距离使然。陆上运输的高昂成本阻止了满洲人将其影响延伸到长城之外。不过他们有蒙古盟友，在雍正朝的许多规划都是通过经济吸引力、外交结盟和军事力量来赢得这些盟友的。1731年雍正朝远征的惨败证明了中央欧亚是如何贫瘠，且地域幅员辽阔，从而严重抑制了清朝扩张。但雍正通过提高官僚效率的内政改革而为将来的扩张奠定了基础。濮德培认为，这种政治生态模式带来清朝军事扩张的四个关键特征：与游牧政权建立者的边疆关系，军事战略，后勤和与相邻帝国的谈判。在以上的每个领域之中，清朝都遵循先例，但都将其远远超越⁴。清朝扩张模式整合了边疆关系、军事战略、后勤和外交，从而解释了为何仅仅在18世纪，一个北京统治的王朝能够消灭其游牧竞争者，并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一个最大的帝国。民族主义史学将清朝在西北的军事行动描述为一系列按照胸有成竹的战略设计而渐次实施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处处可见的，其实是边疆征服的不可预见性。清朝皇帝们、将军们和官员们都非常明白他们深入的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未知领域，直到后来他们才将所有发生的事件重新解释为都是命中注定的。⁵

在这些边疆地区，清朝统治者面临着其他欧亚帝国的相同挑战，采用了相同手段。俄罗斯和奥

¹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4.

² Joseph F. Fletcher,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 Beatrice Forbes Manz, (ed.), Aldershot, Hampshire: Variorum, 1995, II, pp. 219-220.

³ Kwangmin Kim, *Saintly Brokers: Uyghur Muslims, Trade, and the Making of Qing Central Asia, 1696-1814*,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8, pp.34-7, p. 39.

⁴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518-520.

⁵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23.



斯曼帝国也在18世纪划定稳定边界，甄别族群，英帝国在19世纪也在印度采取同样做法。它们都在新地区开展民族调查，为了财政便利而维持当地秩序，就地固定身份认同。他们用当局等级分明的固定官职取代了朝秦暮楚的自治的游牧社会。这一举措明确了被纳入国家体制之中的臣民身份，不过却没有消除他们之间的所有差异。官僚结构必须适应边疆地区，也没有照搬内地整齐划一的模式。札萨克不只是蒙古外衣之下的地区行政长官，满洲八旗也不是¹。在边疆地区，雍正和其继承者们精心制定了在内地受轻视的封建制：伯克制、札萨克制和喇嘛僧侣制度，保留世袭的权力，尽管它要经过清朝官员批准，在典型的地方行政长官之外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在实践之中，这种协商的授权对于边疆管辖添加了有益的灵活性，在那里接受中国古典传统教育的精英很少，而当地人遵循的是其他文化规范。在中国边疆地区，治国者们面对与内地相同的决策：如何诱使竞争势力屈服于扩张的帝国。帝国统治的一个特征——灵活的、协商的当地管辖随处可见，但在边疆地区比起其他地区更为显然²。

一些新清史学者认为清帝国和一些欧洲帝国之间有着某些相似性，诸如通过当地精英实行间接统治，实行多元化的法制体系，对处于同一帝国之内的各殖民地属民实行混合政策，并将这些类似性视为清帝国和欧洲帝国之间存在暗合纽带的证据。但是金光明认为这种寻找相似性的研究取径不仅大有问题，而且违背历史事实。他认为就超级强国控制其他族群方面而言，从古罗马帝国到汉朝之间也能很容易地找到相似性³。他进而指出了日本学者与美国学者的差异。即日本学者不仅强调发现该地区相似的历史发展，而且也突出强调类似发展背后的共同历史条件和内部联系等因素。他们将自14世纪以来存在着的中国朝贡体制和白银流入东南亚和东亚的海上贸易世界，视为高度商业化的结果，将该地区国际贸易联系的加深视为一个大背景。在此之中，共同的“早期现代性”出现。商业化一直是社会史学家的研究领域，他们有兴趣专注于从早期现代时期边缘欧亚（Eurasian Rim）去寻找经济发展对比，诸如西欧资本主义为何会兴起，而中国却未能如此之类。与此同时，讨论帝国扩张和殖民是政治史学家的研究范围，他们注重内亚清帝国多民族国家的构成。因此，金光明主张将那种明显忽视探讨商业利益和帝国扩张之间联系的观点称之为“欧洲例外论”（European exceptionalism）⁴。

濮德培还指出，在清朝新疆管辖与实行“开化使命”的西方早期现代国家管辖方式之间存在着差异。清朝统治者对于他们的新领土有着什么样的理想？一些学者将清朝的意图描述为一项“教化使命”，类似于法兰西帝国的目标。根据这种观念，帝国官员奉行传统的儒家要求，将蛮夷转化为文明人以便创建一个统一的、秩序井然的等级制度。但清朝的目标绝非如此简单。教化只是它的目标之一，但它时时被维持原始居民免于因与文明接触而堕落的同样强烈的需要所抵消。此外，源于中央的、或来自高层官员的理想，在极其不同的当地状况中实施之时，总会遭遇障碍。帝国第二个重要的张力是这些不一致的理想与它们在当地管辖实践之间形成的缺口。差异也内在于帝国的治理目标之中，既由于它不赞同统一化（uniformity），也是对当地抵制的合理回应。与此同时，官僚效率的需要都在推动行政方式的标准化。满洲人的特殊地位即自身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统治着一个汉人人口占主导地位的帝国，对于消除差异尤其敏感。因为完全合理化的、开化的帝国需要遵循的对于所有臣民一视同仁的原则，将消除满洲身份认同的所有特征。赞同清朝“汉化观点”学者主张：满洲人被完全同化于汉文化，将其正统地位唯一依赖于根据天命而创立的秩序。但这一观点忽视了清朝统治的突出方面，即忽视了满洲贵族持续关注维持与汉人大众不同的特殊性，表现在婚姻政策、

¹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12.

²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58.

³ Kwangmin Kim, *Saintly Brokers: Uyghur Muslims, Trade, and the Making of Qing Central Asia, 1696-1814*,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8, pp. 366-367.

⁴ Kwangmin Kim, *Saintly Brokers: Uyghur Muslims, Trade, and the Making of Qing Central Asia, 1696-1814*,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8, pp. 369-370.



隔离居住、宗教仪式等方面，八旗制度作为维持其统治的基础尤其值得注意。此外，汉化观点如同教化观点一样，忽视了清朝如何在其臣民中继续再登记其差异。差异和统一之间的张力既适应于汉人也适应于非汉人口，但在边疆地区变得更为显然。在那里文化多样性不仅延续下来，而且还在被加以构建。当地人群、民事和军事不同的管辖结构彼此之间的均衡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必须将其有限力量部署在这么广阔的空间。这并不反映出一种单独的教化工程或民族主义合并，而是在官僚的、强制的和当地的环境之间的多方调适¹。

濮德培认为，将孟子对于大众福祉的关切与清朝建立庞大的粮仓供给体系直接联系虽然很有益，但也过于简单化。此外，仅凭清廷对其臣民福祉抱有家长制式的关怀，还不能解释帝制体系为何长期存在的原因。同样重要的是头脑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意识到军事力量是对内镇压叛乱和对外战争方面的国家基石。王国斌（R. BinWong）赞同那些强调中国与好战的西方形成反差的反战倾向的观点。但帝国统治仰仗于社会福利和战争，两者相辅相成，其平衡随着时间变迁一直在变化，却都没消失。中华帝国的安全考量与那些欧洲国家相比没有显著差异²。

（三）经济和贸易

根据金光明的观点，清朝军队深入到塔里木盆地，给当地的绿洲穆斯林创造了许多新的贸易机会。战时环境与其说是灾难，不如说是带给绿洲穆斯林社区的一个机遇。尤其是清朝远征中亚对于穆斯林商人很可能意味着一个经济非常繁荣的时刻的到来。而正是在期盼商业繁荣的基础上，额敏和卓建立了当地穆斯林的新联盟以支持清朝进一步扩张，包括它后来深入中亚³。

取代准噶尔地位之后，清朝认为有权从绿洲穆斯林索贡，耐人寻味的是没有汉文资料记载与此有关的信息。清朝的满洲君主将帝国版图扩张的伟大功业比肩于中国的伟大王朝如汉朝和唐朝，但清朝追求物质利益的粗俗表达展现在汉人官员和学者面前却不是一幅很恰当的画卷。不过从当地穆斯林的眼光来看，这种经济索取正是清朝统治的意图所在⁴。清政府首先将穆斯林绿洲视为征服其先前的领主准噶尔部之后所获得的一片经济属地⁵。注意税收结构也显示出清朝努力调整穆斯林绿洲新的经济结构。在税收人口和农田减少的不利环境下，清朝削减了农业税和人头税的税额。然后，清朝试图弥补农业税和人口税的减省而增加了另外一个税种即关税。为了补偿因战争毁坏带来的损失，清朝更积极地试图利用穆斯林新疆与清境之外穆斯林绿洲的长途贸易⁶。在清朝以前，布鲁特（柯尔克孜）是支配穿越帕米尔地区商路的主宰。早自叶尔羌汗国以来，布鲁特游牧民是前往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贸易路线中的最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他们轻而易举地抢劫商队。为了避免劫掠，商人不得不向他们缴纳高昂的保护费或过路费。尽管准噶尔蒙古人自17世纪后期以来一直是绿洲穆斯林的宗主，却没有在穆斯林绿洲驻扎任何部队。如果布鲁特人抢劫穆斯林商人，即使准噶尔蒙古人想要加以保护，也是鞭长莫及。清朝在该地区确立统治之后显著改变了这一局面。对于中亚穆斯林商人社区而言，新崛起的清朝统治是可喜的发展态势，向商路提供安全保障，而直到那时为止这种保障还是可望而不可求的⁷。

¹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337-338, p. 340.

²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31.

³ Kwangmin Kim, "Profit and Protection: Emin Khwaja and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 1759-1777",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71, Issue 03, August 2012, p.611, pp. 613-614.

⁴ Kwangmin Kim, *Saintly Brokers: Uyghur Muslims, Trade, and the Making of Qing Central Asia, 1696-1814*,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8, p. 169

⁵ Kwangmin Kim, *Saintly Brokers: Uyghur Muslims, Trade, and the Making of Qing Central Asia, 1696-1814*,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8, p. 345.

⁶ Kwangmin Kim, *Saintly Brokers: Uyghur Muslims, Trade, and the Making of Qing Central Asia, 1696-1814*,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8, pp. 180-1816.

⁷ Kwangmin Kim, *Saintly Brokers: Uyghur Muslims, Trade, and the Making of Qing Central Asia, 1696-1814*,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8, pp. 235-236.



将来自穆斯林绿洲的进贡玉石纳入内务府垄断之下的做法，显示出乾隆朝廷则紧密遵循着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出现在东北地区的早期满清君主的惯例¹。不过清朝重新利用旧式内亚做法达到的是新的目的。满清抽取当地贡物用于商业目的，获得玉石以便销往中原市场牟利。换言之，玉石纳贡是清朝国家作为商人确立市场主宰的一种方式。早期草原帝国也向商人征税，也加入到长途贸易组织中去，但却没有作为垄断商人去开发过处于统治之下中原市场。玉石朝贡展现出满清将旧式游牧作法和瞬息万变的现代市场巧妙地融为一体²。从这种意义来说，中亚的清帝国可以算是明朝朝贡体制持久影响力的结果，这种持久影响力源于东亚中原市场的吸引力。在清朝统治南疆期间，坐镇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帝国驻扎大臣利用与明朝朝贡体制相联系的外交惯例和礼仪而与中亚统治者联系。穆斯林合作者最重要的作用是管理诸如浩罕等地的中亚商队。作为确保与中国贸易新通道的长途贸易安全的军事力量，清朝驻军和行政管辖进一步加深了中亚商队对中国的依赖³。

关于明清的白银流入，濮德培指出，不应夸大16世纪白银流入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大陆部分地区的商业繁荣需要白银，但其他地区保持着自给自足和非货币化的状态。尽管在长城沿线存在大量戍守部队，那里却并没有产生地区性的商品经济，因为部队需求大体是由实物供应的。明朝官员很不情愿接受白银的支配地位，同时抱怨它所具有的破坏性社会影响。不过，清朝却更衷心拥抱商品经济和将货币影响推向遥远边疆地区的政策⁴。他进而指出，转向海上贸易路线，并不对中央欧亚边疆地区有着重要冲击，也不是蒙古衰落的主要原因。贸易继续繁荣，从17世纪到18世纪它甚至在增长，因为清朝统治者精心控制陆路贸易以吸引游牧民前来归顺。旧的丝绸之路路线转向官方的边境城镇，但相同的商品，相同的商人接踵而来。海上贸易税收直到18世纪后期英国人到达广东才变得重要，而到那时，满洲人在运用贸易来控制桀骜不驯的蛮夷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将他们从西北所学到的运用到南方海岸⁵。

狄宇宙认为，如果考察朝贡行为方式，那就不仅要从帝国中心，而且也要从其实施的边疆地区的接触点加以审视。他将朝贡概念发展成一种围绕清朝在边疆地区所有关系的“环境”，包含贸易、安全和礼仪联系⁶。濮德培则将其解读为一种跨文化语言，它可以为跨文化交流的各方参与者提供多重功能。像“混合语”（pidgin）或是所有多文化接触地区的贸易语言一样，朝贡话语允许广泛的贸易交换，用形式语言掩饰其参与者不同的自我定位，还允许各方维持着不同程度的自治⁷。

濮德培将清朝与哈萨克、准噶尔、俄国以及在广州与英国的贸易做出对比，借以阐明这些贸易关系的若干特征。这四种边境贸易，从清朝视野来看，具有从安全导向到利润导向之间的不同差异。对俄贸易完全是出于安全利益，因为即使俄国商队带到北京的最奢华的毛皮，也在满洲贵族那找不到多少穿戴者。相反，准噶尔在西北地区提供具有真正价值的马匹和畜产品，不过清朝首当其冲的目的却是用贸易驯服那些游牧民。哈萨克贸易介于准噶尔和广州贸易两者之间，它更是商业而非政治导向的，官员们在利润获取方面有着更大的份额，但主要是由需求马匹而驱动的。广州贸易直接向内务府提供可观的利润，不提供战略物资，而产生出官员和外商之间更紧密的合伙关系（新疆玉石贸易，直接将利润提供给内务府，内务府也参与广州贸易）。准噶尔人和俄国人一直对边疆构成

¹ Kwangmin Kim, *Saintly Brokers: Uyghur Muslims, Trade, and the Making of Qing Central Asia, 1696-1814*,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8, p. 267.

² Kwangmin Kim, *Saintly Brokers: Uyghur Muslims, Trade, and the Making of Qing Central Asia, 1696-1814*,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8, p. 356.

³ Kwangmin Kim, *Saintly Brokers: Uyghur Muslims, Trade, and the Making of Qing Central Asia, 1696-1814*,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8, pp. 349-351.

⁴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83

⁵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00

⁶ Nicola Di Cosmo, "Kirghiz Nomads on the Qing Frontier: Tribute, Trade, or Gift Exchange", in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edited by Nicola Di Cosmo and Don J. Wyat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3, pp. 351-372.

⁷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03.



明显的军事威胁，清朝需要敏锐地运用威压和物质财富的软手段来劝说他们约束自己的行动。官员也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哈萨克人，但并不将其视为主要的军事关注目标。在广州贸易的早年，即在鸦片贸易主导之前，清廷并不觉得英国商人有什么危险，而只是认为他们太贪婪。随着西北扩张大功告成之后，忧患意识逐渐递减。哈萨克人被视为新的族群，此前从未与帝国来往过，而准噶尔人则是早已熟悉的打交道的对手。与哈萨克的贸易，正如皇帝所强调的，不属于旨在控制难以驾驭的游牧民的“羁縻”政策范围之内，而是在帝国范围之外与化外之民贸易关系的一种形式，尽管清朝的确批准任命哈萨克部落首领。清廷在1750年代扩张地区明确划界：蒙古和帕米尔以东的突厥斯坦在其范围之内，而俄国和哈萨克却不是。不过，准噶尔不只是清帝国界外的贸易者，而且是满洲最大的敌人。清朝打算永远停火吗？为何能心平气和地设想在阿尔泰地区有一条稳定的边疆，以及一个保持独立的蒙古政权？濮德培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尽管准噶尔不再具有威胁，且双边贸易繁荣，但清朝也不会容忍一个与之竞争的位于中央欧亚的蒙古政权。从这个意义来说，清朝的地缘政治战略既是文化的，也是民族的。所有的蒙古人都必须被纳入大一统帝国范围之内，但其他民族却不必如此。到18世纪中叶，每一个主要的中央欧亚族群，就其与帝国关系而言，都已有明确的地位：蒙古人被并入或是被消灭；俄罗斯人被一条绘制的固定边界所隔开；哈萨克人在界限不清的地区贸易，但他们不是征服的目标；突厥斯坦人被帕米尔高原分为东、西两部分；土尔扈特蒙古人的回归代表了在多文化的清朝精英簇拥之下中央欧亚的各族群最终的大团圆。贸易、安全和民族划定一起决定谁在帝国之内而谁在其界外¹。

（四）清帝国管辖新疆的机遇与挑战

濮德培认为，通过合并和发展新疆，清帝国既给自己带来机会，也带来危险。这确保了该地区免于被其他强国控制和处于烦扰的自治状态，与俄国形成固定的边界，并一度避免了来自沙俄帝国的侵扰。殖民和一体化政策加强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鼓励来自内地的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来自西北的移民缓解了其原居地的资源压力。官员们必须加大对新疆的灌溉工程、工具、种子和牲畜的投入以维持农垦。他们提高土壤的生产力，以减少牧场为代价而扩大田地规模，与内地形成重要的贸易纽带。新疆在某种程度上前所未有地与汉地中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一地区从不能自给，需要来自内地的持续补助以维持生态和社会平衡。不过到19世纪，资源转移到内地之时，新疆开始不稳定，叛乱频繁，直到19世纪中叶被阿古柏完全占领，这是清朝鼎盛时发展政策的不曾预料的结果²。

濮德培认为，清朝征服西域带来的影响包括：在中期，清朝征服的结束产生了导致19世纪到20世纪初帝国解体的某些元素。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些征服基本上确立起中国领土和文化认同，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自我再建奠定了基础。“我们已看到统治者如何发展出他们作为天下共主的自我概念，在扩张进程中以独特但相互重叠的文化传统来容纳多民族。在文化定位中没有单一的鲜明转折点，而是用天降大任的一种发展意识来囊括众多却并非全部欧亚文化于单一国家观念之下。”³清朝完成对西北边疆的征服重构了“中国”和“汉”认同。18世纪在中国还不是民族主义时代，但却为19世纪后期对于中国民族国家加以定义预设了一个框架。这一框架包括明确边界，确定汉人、满人、穆斯林、藏人的民族和系谱认同，建立控制多民族的帝国规划，合并非汉民族作为从属他者⁴。北京史无前例地推进到欧亚中心是由满洲形成的三元文化征服精英，充满活力的商品经济渗透到边缘地带，娴熟运用外交等诸合力的结果。更引人注目的是，事实上从长期来看，现代民族国家几乎重建了两百年前的祖先帝国。但现代民族国家/帝国也取决于偶然事件而非任何必然。过去经验可在

¹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05-406.

²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57.

³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07.

⁴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17.

21世纪给那些有兴趣为他们国家形成一个新认同的中国人提供某些借鉴¹。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看出西方学者在如何看待清朝平定和管辖新疆的问题上，持有两种观点，即内亚草原帝国论和早期现代帝国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米华健、吴芳丽、狄宇宙等人，后者的代表人物则是濮德培、金光明等人。

内亚草原帝国模式被狄宇宙加以系统理论化。他认为，内亚游牧民对于定居社会所采取的贸易-袭扰模式(Trade or Raid Theory)²释放出巨大的动能，由此奠定了内亚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中的中心地位。他根据内亚历史的周期性从游牧政体不断进化的过程中概括出几种不同的国家形态。³由于清朝依赖于后金时期(1616-1644)已积累起来的有关国家和社会的大量知识资源，才使自己在获得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社会政治融合程度方面，远远高于早先的内亚政体。满洲人也保留着内亚传统，诸如“克里斯玛”(charismatic)家族的首要地位，继承原则与基于血统而获取公职的特权，维持种族、宗教和语言划分。满洲是具有高度军事化的社会，能够对于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帝国实行和维持少数民族统治，这与他们更紧密关注被征服社会的情况，整体上非掠夺性的统治态度，节俭的中央政府，中心与边缘地区之间高度发展的通讯体系等因素密切相关。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们有能力在被称之为旗制的军事官僚组织内限制贵族膨胀和通过贵族角色的制度化来防止离心倾向。朝贡关系仍旧是管理外交的一个方式，但与维持国家机器无关。在乾隆统治时期(1736-1799)，征服进程也达到其巅峰，包括合并西藏和新疆，摧毁准噶尔汗国。清朝在如下方面达到了近乎理想的均衡：在征服时期建立的军事化社会和扩大的统治精英与从汉地(China)获取的统治资源之间，在征服者的统治特权与征服之地的行政机构之间，在社会融合与文化保护之间。早在18世纪，满洲朝廷和族群的内亚特征开始消褪，或仅仅具有象征性。由于内亚内外发生的急剧转变，到19世纪，内亚帝国传统几乎荡然无存⁴。

此外，狄宇宙也对清朝属于早期现代帝国的观点表示质疑。他认为从采用火器的角度观之，早期满洲政权的军事历史显示出清帝国的建立至少是属于一个被定义为早期现代的更大全球趋势的一部分。但是全面分析满洲军事还应当包括几个其他方面，例如蒙古部队的角色和整合力度，贵族领导层与普通士兵之间的关系，军队中不同兵种的专业训练和功能[诸如宫廷侍卫，巴雅拉护军营(Bayara，满语意为“老汗王的贴身卫士”)，前锋营]，组织武器生产，获得军用财政资源，管辖机构不同军事、民政部门的形成和分离⁵。

与此观点相对，濮德培强调满洲精英尤其关注帝国边疆地区。在“满洲殖民主义”(Manchu colonialism)的分析框架之下，一些学者探讨了清朝统治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特点。他们倾向于认为，有理由将清朝与其他殖民帝国加以比较。如同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和莫卧尔帝国等农业帝国一样，中国面临着控制、扩张、正统和征税问题。与民族主义的叙事相反，中国并非是西方殖民主义独特的受害者，也非因持久的官僚和文化传统而独一无二。中国的鲜明特征更像是当前“社会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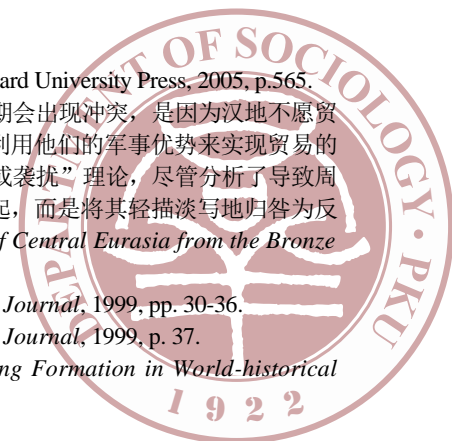
¹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65.

² 贸易-袭扰模式或理论(Trade or raid Theory)：汉地(China)和游牧民之间定期会出现冲突，是因为汉地不愿贸易或用纳贡来补贴游牧经济，从而迫使游牧民们自我组织起来成为袭击集团，利用他们的军事优势来实现贸易的经济功能。对此白桂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认为狄宇宙提出的“贸易或袭扰”理论，尽管分析了导致周期性的和平和战争交替的某些原因之外，这一理论并没有解释游牧帝国为何崛起，而是将其轻描淡写地归咎为反常现象，具体参见 Christopher I. Beckwith,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and Oxford, 2009, p.343.

³ Di Cosmo, "State Forma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Inner Asian History", *World History Journal*, 1999, pp. 30-36.

⁴ Di Cosmo, "State Forma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Inner Asian History", *World History Journal*, 1999, p. 37.

⁵ Nicola Di Cosmo, "Did Guns Matter? Firearms and the Qing Formation", in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市场经济”特色一样，它们是广义的市场经济概念之下的各种变化形式，而非完全不同类型¹。

尽管内亚草原帝国论和早期现代帝国论在分析之时侧重点有所不同，二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米华健、狄宇宙等学者们也指出在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司法结构、多种管辖形式、“前沿防卫红利”、采用枪炮等热兵器、渴望生存空间等方面清朝与沙皇俄国、不列颠帝国以及其他欧洲帝国有着类似性。而濮德培、金光明则认为清朝作为早期现代帝国也具有一些内亚属性。狄宇宙指出：“也许可能将清帝国，尤其是其在内亚的帝国扩张视为殖民统治的一个案例。欧洲殖民帝国也通过发展出复杂的官僚机制，以便于实现更可靠和有效的经济渗透和军事保护，从而对于当地形势和战略目标作出响应。这些机构，往往反映母国的政治和司法传统，但也基于特定的历史经验而做出变化和修改。在西藏、蒙古和新疆的清统治大体上与欧洲深入海外属地大同小异：清帝国也通过依赖当地精英，通过将属地（dependencies）与中国核心地区（metropolitan China）分开而为所获得的领土发展出原始的管辖体系。与当地人相比，中国军队和定居者的人数很少，利用宗教和当地习俗招降当地人。复杂的清帝国内亚管辖体制的存在和演变是出于纯粹的领土征服和同化为逻辑，在面对境内政治动荡和强大国外威胁之时能长期成功，这些因素使其更接近于其欧洲同行，而与中国历史任何时段相分离。”²

事实上濮德培认为，在对清帝国从事讨论时，最好的办法是这两个视角结合起来。看来就清史论清史，这样做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当我们把问题转向如何看待从明到清的历史转变之时，分歧就变得比较明显了。罗友枝（Evelyn Rawski）认为，清王朝作为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帝国是满洲统治的特有历史产物，这在明朝汉人统治下是不可能出现的。换言之，中国的早期现代性的确开始于王朝更迭的1644年，而非此前。³与她的观点针锋相对，卜正明（Timothy Brook）认为晚明属于早期现代世界，而清朝却不是。他指出：“在此政治交替的关键时刻（明清更迭），南方涛动，海上扩张开始出现，这一场景被史学家称为早期现代世界：这时增长着的贸易网络激励创新并将各个不同世界的经济相互联系，演变成单一的全球经济。我们习惯于认为来自欧洲——特定沿海地区的人们创造出这一早期现代世界，但是明朝的人们和其他地区的人们也一样参与了上述进程，从而使这个世界孕育而生。遗憾的是，就在明清之际他们也分道扬镳了。明朝被清朝取代的这十年里，欧洲的外交官正忙于参与一系列会议，旨在结束在欧洲上演的最长战争，巩固新型的政治、商业力量从而使现代世界能得以顺利发展。而其最后的协议，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以今天世界秩序为基石的国家主权法则。‘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保障欧洲最有条件的国家演变成新型帝国，而这与蒙古帝国、满清帝国不同，从此使得欧洲和中国在此后沿着不同的历史轨迹运行”⁴。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欧亚近似论”来源于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很久以前，汤因比、拉铁摩尔等学者试图在全球史框架之下寻找东西方的“同时代性”（contemporaneity），而正是拉铁摩尔首次提出公元1600年可找到这种全球联系。因此，我们可认为傅礼初正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最终形成1500-1800年之间出现七种平行现象的全球整合历史（integrative history）。

西方学者在清朝平定和管辖新疆而呈现的内亚草原帝国和早期现代帝国模式，都属于国家建构层面。在探讨历史上的中国内地与新疆之间互动之时，三十多年以来的西方学者基本上都运用世界体系（World-systems）的框架加以分析。世界体系理论是历史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区域互动的分析框架。他受到法国年鉴

Time, edited by Lynn A. Struv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2004, p. 161.

¹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42.

² Nicola Di Cosmo, “Qing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Inner Asia”,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998, 20, 2, p. 306.

³ Rawski, Evelyn S, “The Qing Formation and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in Struve, ed.,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edited by Lynn A. Struv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2004.

⁴ Timothy Brook, *The Troubled Empire-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64.



学派费迪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历史分析以及贡德·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影响，主张自16世纪以来的欧洲政治经济发展需要更大范围的跨国框架加以分析，并将这一框架称之为“世界体系”（world-systems）¹，其理论体系的核心就是中心-边缘（core/periphery）。其后许多历史学者利用其不断修正过的理论框架来试图容纳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心-边缘地区之间的互动。正如前文所述，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央政府管辖新疆之时，勾勒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等层面不同的权力关系。在探讨新疆国家建构即清朝管辖新疆之时，西方学者们突显“世界体系”框架之下中心对于边缘的控制，往往将中心-边缘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典型模式——宗主国（metropole）与殖民地（colony）框架关系套用到中央政府管辖新疆方面，声称要解构民族主义元叙事（meta narrative），意在凸显中国如同其他列强一样也从事领土扩张和殖民管辖，从而也将中国列入帝国主义阵营之中，这无疑依旧是西方学界“西方中心主义”因素挥之不去的影响，强调西方历史发展过程的普世性，而且这也是殖民主义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²发酵的结果，但却很少在中国和西方殖民列强之间求异，往往忽视了有别于西方的历史经验。此外，在新疆与内地整合进程之中，西方学者突出当地反应在这一整合进程之中的反作用。

寻根溯源，这种学术潮流仍旧要追溯到傅礼初³。他是继拉铁摩尔之后另一位内亚学巨擘，早在1968年因其发表的论文《1368年至1884年中国与内亚》（China and Central Asia, 1368-1884）而在学界声名大振，该文收录在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中⁴。1978年傅礼初参与编撰了费正清《剑桥中国史》晚清史上卷，并撰写其中两篇文章《约1800年之时的清内亚》（Ch'ing Inner Asia c.1800）⁵与《清朝统治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期》（The Heyday of the Ch'ing Order in Mongolia, Sinkiang and Tibet）⁶，对包括新疆在内的清朝内亚地区进行全面分析。他掌握汉语、蒙古语、满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多种突厥语等二十多种语言，因而能在内亚边疆研究领域大显身手。不过就新疆研究而言，傅礼初只撰写过几篇论文，但他“既开风气又为师”，深远地影响了后来学术研究趋势。其一，他所提倡的欧亚近似理论和内亚视角开创了美国明清史研究的两大学派阿尔泰学派和加州学派⁷。其二，他执教哈佛多年，桃李满天下，王国斌（R. Bin Wong）、金浩东（Hodong Kim）、濮德培（Peter C. Perdue）、李普曼（Jonathan N. Lipman）、涂逸珊（Isenbike Togan）、林蔚（Arthur Waldron）、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等来自不同历史研究领域的众多著名学者都曾受其耳提面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是在傅礼初影响之下，内亚研究领域尤其是新疆研究，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注意发掘少数民族语言文献材料。此外，由于70年代末中西方关系的改善，外国学者能够再度进入中国，甚至可前往新疆检索原始资料和从事田野考察，由此新疆研究进入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研究呈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其一，不再局限于汉文和英俄等原本视为主流学

¹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第一、二、三、四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² 这一观点来源于塔妮·巴娄（Tani E. Barlow），她挑战了现代性（modernity）和殖民主义（colonism）仅仅是西方舶来品的观点，认为殖民主义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如何在亚洲演变为独特形式。参见：《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edited by Tani E. Barlow,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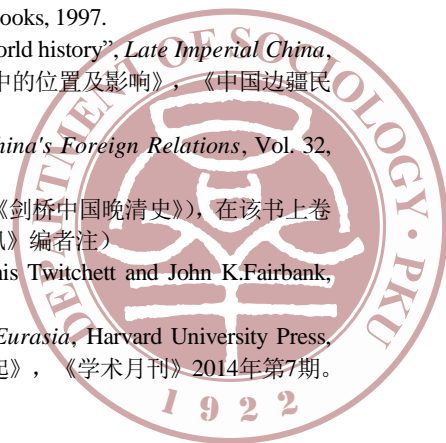
³ 对于傅礼初（Joseph F. Fletcher）学术研究述评，参见：R. Bin Wong, “China and world history”, *Late Imperial China*, Volume 6, Number 2, December 1985, pp.1-12; 钟焯：《傅礼初在西方内亚史研究中的位置及影响》，《中国边疆民族研究》2011年第6期。

⁴ Fairbank, John King, and Ta-tuan Ch'e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Vol. 3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⁵ Joseph F. Fletcher 也译为约瑟夫·弗莱彻（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在该书上卷中，这一章的篇名译为“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编者注）

⁶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1), edited by Den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⁷ 具体参见：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664. 对于加州学派评述，参见赵鼎新：《加州学派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学术月刊》2014年第7期。



术语言的文献，而相当程度地挖掘满文、蒙古文、维吾尔文等民族语文或域外语文材料。其二，从中心转向边缘视角。其三，过于强调当地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对抗而非互动，这无非是将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移植到新疆研究之中。其四，西方学者运用韦伯、福柯、布尔迪厄、萨义德、哈贝马斯、安德森、巴斯等学者的多种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开展新疆研究，实现了研究范式的一次转变，这也是1960年代“汉学”向“中国研究”转变¹在新疆研究的具体体现。

无独有偶的是，无论是将清朝视为内亚草原帝国还是早期现代帝国的观点，都在某种程度上质疑清朝作为中华帝国，或换一种说法，认为清朝不属于中国传统王朝的观点²。实际上这反映出视角的不同。狄宇宙、米华健等学者以内亚视角来审视清朝，当然更倾向于将清朝视为一个“内亚帝国”，而濮德培以及加州学派学者从比较史学出发寻找欧亚近似点，从而将清朝（某种程度上包括明朝后期）视为“早期现代帝国”，这在某种程度上补正我们在开展史学研究之时，不可避免地显露出“中原中心论”和“汉本位”的史观局限，这些思维定势往往来源于汉文资料所弥漫的那种华夷观或传统天下观。不过，如果刻意标新立异地将清朝的“内亚属性”“欧亚近似属性”过度放大，进而提出颠覆清朝作为一个中国王朝的观点，那就会本末倒置，滑天下之大稽。

【论 文】

制度与行为：教育援藏过程中的组织因素

——以高等教育援藏干部选派和在藏行为模式为分析对象

谢伟民³

摘要：高等教育援藏有别于对口支援西藏制度体系下的其他部分，有自身独特的逻辑。谁援藏，在藏期间如何行为，是整个高等教育援藏的重心。本研究引入制度分析而非政策分析，关注制度过程中的组织因素，认为教育援藏首先是组织行为。以此基础对政策约束下的理性算计行为模式进行批评，提出成功的援藏干部选派是组织权威、组织对援藏的意义构建与个人对援藏的理解认知互动的结果；在藏行为则发生在具体的组织情境和环境中，适当性行为取代个人理性计算。进一步，展现了高等教育援藏制度过程中的价值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冲突，突出制度绩效的长效模式而非短期逻辑。

关键词：高等教育援藏；制度过程；组织；价值逻辑；市场逻辑

一、引言

¹ 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文汇报》2007年5月7日。

² 美国著名新清史学者欧立德（Mark C.Elliott）曾于2013年5月6-7日曾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讲学，笔者聆听讲座并在尾声之时曾当面提问，“清朝是一个内亚帝国（Inner Asian Empire），早期现代帝国（Early modern Empire），还是中国的传统王朝（Traditional dynasty）”之时，欧立德认为“清朝是一个中国传统王朝”。

³ 谢伟民，男，1986年出生，西藏大学政法学院讲师。

